

被归入大学所要开设的“随意科目”之中。其中,对“古生物学”的界定更像是今日的“考古学”,因为它是一门“考究发掘地中所得之物品,如人骨、兽骨、刀剑、砖瓷以及化石之类,可以为史家考证之资者”<sup>①</sup>的学科。

1907年,黄节、邓实等人拟设“国粹学堂”,分设21个学科门类。包括:经学、文字学、伦理学、心性学、哲学、宗教学、政法学、实业学、社会学、史学、典制学、考古学、地輿学、历数学、博物学、文章学、音乐学、国画学、书法学、武事学和译学。这里,最值得注意的是单立了“考古学”门类。虽然“考古学”门类,从其开设钟鼎学、石刻学、金石学史、美术史等课程来看,似乎与传统的“金石学”相类似,但其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基础上,吸收西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产物。这似乎可以说明,作为近代学科之一的考古学,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开始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确定了下来。

## 第二节 早期考古学知识的传播

正如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创立与近代地质学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近代考古学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,首先与19世纪中叶后对西方地质学著作的译介相关联。至20世纪初期,中国学者介绍西方历史学的文章、著作渐渐增多,更多的考古学知识伴随着历史理论和文明史的译介被介绍进来,并开始把考古学当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。

### 一、地学著作的译介与考古学知识的传播

19世纪中叶后西学大规模地进入中国,传统的輿地之学渐为西来的地学所取代。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译介玛吉士(J. M. Marques)所著《地球天文合论》时说:“夫地理者,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,山川河海之名目,分为文、质、政三等。其文者,则以南北二极,南北二带,南圆北圆二线,平行子午二线,赤寒温热四道,直径横纬各度,指示于人也。其质者,则以江湖河海,山川田土,洲岛湾峡,内外各洋,指示于人也。其政者,则以各邦各国,省府州县,村镇乡里,政事制度,丁口数目,其君何爵,所奉何教,指示于人也。此三者地球之纲领也,不可缺一。”<sup>②</sup>此后,地学的“地文”“地质”“地政”三分说为学界所遵循。虽然具体的解说不尽相同,有时还相去甚远,但是那时不少以

<sup>①</sup> [清]张百熙: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,《张百熙集》,岳麓书社2008年版,第209页。

<sup>②</sup> [清]魏源:《海国图志》卷九六,岳麓书社1998年版,第2188页。

“地学”“地质”命名的译介西方地学的书籍,大多涉及地层堆积、人类远古遗存及考古发掘等知识。其中玛高温(D. J. M. Gowan)口译、华蘅芳笔述的《地学浅释》便是典型一例。

《地学浅释》刊印于清同治十年(1871)<sup>①</sup>,是中国最早译介的西方近代地学著述之一。著者英国人雷侠儿(C. Lyell),今译莱伊尔,是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。该书原本 38 章,译著分为 38 卷,前 9 卷论岩石类型及地质概念;第 10—27 卷论历史地层学;第 28—34 卷论火成岩;第 35—37 卷论变质岩;第 38 卷论矿床学。其中卷十名为“论今时新叠层及后沛育新叠层”,主要是关于远古人类遗存的发掘和研究状况,大致依从晚期到早期的时间顺序叙述。如在“瑞西湖中古屋”一节,讲述考古学史上著名的瑞士湖上村落,并指出“其土中古物甚多,可与石刀、铜刀、铁刀之说相证”。该卷还论述了所谓石刀、铜刀、铁刀“三期说”及以地层分期的方法:“太尼地方有一皮脱厚层(皮脱者,草木于北方之地枯而不朽,所积之层也),其中有淡水僵石及陆地兽骨。其形皆与现今本处之生物无异。其皮脱之下层二十至三十尺深处,得古时石刀,在松树根中。而其上层皮脱中则有古时铜刀,在栗树根中。考之古史,知其处并不宜松,所以知此刀此树尚在未有文字之先。意其处先有松后有栗,故松树之皮脱在下,栗树之皮脱在上,均能积成厚层。其有松之时,古人以石为刀,未知用铜。及有栗树时,其人已知以铜为刀,而尚不知用铁。今则其地并无松、栗,而有榆林甚茂,其榆树皮脱中遇有铁刀,知其地有榆树之时,人已能用铁矣。”<sup>②</sup>所提及的石刀、铜刀、铁刀的“三期说”,是丹麦学者汤姆森(C. J. Thomsen)《北欧古物导论》(1836 年)和沃尔索(J. J. A. Worsaae)《丹麦原始时代古物》(1843 年)中所提出并得到地层学证实的。《地学浅释》至迟在 1871 年已出版,上距《北欧古物导论》的出版不到 35 年,距《丹麦原始时代古物》出版只有 28 年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,西方学者的一些重要考古活动,也通过传教士之口被介绍进来。如 1874 年丁韪良在《中西闻见录》上发表的《古国遗迹》一文,介

① 该书出版时间一般认为是 1873 年。但据《格致汇编》第 3 卷《译书要略》,以及上海江南制造局《译书提要》卷二记载,《地学浅释》在同治十年(1871)已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售。又据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《总办机器制造局冯、郑上督抚宪禀(附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、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)》中言:“自上年延请西士伟烈亚力、傅兰雅、玛高温诸人各种西书,计前后译成《汽机发轫》九卷、《金石识别》十二卷、《采煤要法》十二卷……《地学浅释》三十八卷……”则《地学浅释》的中译本在 1870 年可能已经问世。

② (英)雷侠儿撰,(美)玛高温口译,华蘅芳笔述:《地学浅释》卷 6—11,江南机器制造局 1873 年版,第 80—81 页。

绍了1870—1873年间谢里曼发掘希腊特洛伊古城考古时事。文中丁韪良首先简略介绍了西方近代各国的考古活动，“在古时亚洲西界有数小国，声名文物彬彬称盛，如犹太、腓尼基、德罗亚是也。缘兹，泰西学士常赴该处掘搜古物，以博见闻”；犹太国为古教圣地，英、美、德、法诸国，“每派人躬往勘寻旧迹，用资考证，兼示不忘本原之意”；英国人常在尼尼微、巴比伦等处，掘地搜寻，得古石殿、石碑、石像无数，其碑字类虫篆，“渐通其文，参之古书，若合符节，所载事迹足补典籍之阙”。最后他说，“近又有德国人在德罗亚搜获古迹甚奇”，荷马史诗曾记载特洛伊战争，“人咸谓风影之说，不过出自诗人铺述，信者绝少”，“今掘地见城，并故王宫，间有金银钱参错土中，及妇女珠饰犹存，足证斯事为实。观于此，可见古人著作考据之真，又可见今人好古敏求之效也”。<sup>①</sup> 丁韪良之文既是即时的新闻报道，又可看作是对考古学知识的专门介绍。

在对考古学知识的介绍和考古活动的报道的同时，将地学、考古学知识运用于历史诠释的文章也开始见诸报端。1876年《万国公报》刊出韦廉臣(A. William-son)所撰《古初纪略》一文，讲解《圣经》所记亚当及其后人的传衍分布时说：“自亚当至洪水时，有谓二千余年者，有谓一万四千年者。旧约所载未经明言，然由地下枯骨及各项器具验之，谓万有四千者近是。”文中提到，亚当长子该隐杀亚伯，离开本土至挪得，其后人又分三支，疑分别是蚩尤及三苗、印度人、黑人的祖先。“其初迁时皆衣兽皮，无铜铁器具，弩矢之镞、鱼标之刃皆以石为之，居无庐舍。后有出为牛羊牧者，始立帐幔，或用皮或用木叶为之。六世后始得铜铁，能制造。”又说：“以上旧约所纪及后世传闻如此，今始得确据。有格物先生开窑至极深处，见有人骨及石器械等，再上于有骨之处始见有铜铁器械，再上始有近今人骨及近今磁器等。”<sup>②</sup>

如果说《古初纪略》在用地学、考古学知识诠释人类早期历史方面尚属模糊和牵强，那么1903年《万国公报》所刊的李提摩太(R. Timothy)与蔡尔康合著《考古征文求助说》一文则要明确得多：“试质诸地学名家，知太古地极卑薄，其所以渐成高厚者，则缘每岁土润溽暑之际，往往大雨将行，山头悬瀑千寻，挟沙石而沉山趾。一年所积，诚属无多；比及百年，约高尺许。准是核计，太古地面诸形迹，今必深陷地心。格致家遂思以掘地代读书，谓土层犹书叶也。书之纪事，逐叶翻新；土之告人，逐层转旧。彼此互相印证，无间

① (美)丁韪良：《古国遗迹》，见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》第32辑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31—433页。

② (英)韦廉臣：《古初纪略》，《万国公报》第404期(1876年9月9日)，第54—55页。

亚欧非美，共分太古之世为古石、新石、铜、铁四代。真知灼见，确切不易。”<sup>①</sup>在此，作者以浅显而准确的语言介绍了“地层”形成过程及在研究古史中的作用。从“以掘地代读书，谓土层犹书叶也”等形象语言中，可以读到考古学独特的获取资料的方式和解读资料的方法。而“无间亚欧非美，共分太古之世为古石、新石、铜、铁四代。真知灼见，确切不易”的表述，则显露出此时考古学已经初步成熟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信心。

可以说，从19世纪70年代起，主要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传播，古人类遗存、地层学、“三期说”等考古学知识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，并逐渐成为史家、学者知识资源的一部分。

## 二、史学著作的译介与考古学知识的传播

对西方近代考古学知识较为系统的译介，则出现在史学著作中。1902年，留日学生汪荣宝署名衮父，在《译书汇编》杂志第9、10期上发表《史学概论》，这大概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法的编译之作。这部译作虽然简略，但参照了日本多位具有西学背景的历史学家的著作。其中自称：“本论以坪井九马三《史学研究法》为粉本，复参以浮田和民、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，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，与本邦从来之习惯，大异其趣。聊介绍于吾同嗜者，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。”<sup>②</sup>

坪井九马三是近代日本著名史学家，曾留学德国。其所著《史学研究法》参照了德国史家伯伦汉(E. Bernheim)的《史学方法论》编译而成。浮田和民的《史学原论》、久米邦武的《史学方法论》等同样受到伯伦汉、巴克勒(H. T. Buckle)等西方学者的影响。虽然坪井氏《史学研究法》所阐发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本于伯伦汉《史学方法论》，但也有一些创新。如《史学研究法》非常重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，书中这一方面的讨论多达160页。而《史学方法论》仅用了19页，较为简略。但两者都重视实物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。如《史学方法论》中列有“印章学”“古泉学”等项，《史学研究法》则将“印章学”归属“古文书学”，将“古泉学”拓展为“铸币学及度量衡学”。《史学研究法》还专列有“考古学”一项。这说明，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近代考古学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方史学界，均已被看作是历史学重要的辅助学科。正因为如此，汪荣宝编译的《史学概论》就涉及了一些近代考古学知识。

① (英)李提摩太、蔡尔康：《考古征文求助说》，《万国公报文选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670页。

② 衮父(汪荣宝)：《史学概论》，《译书汇编》1902年第9期，第105页。